

DOI: 10.13317/j.cnki.jdskxb.2015.015

# 国内学者“大饥荒”问题研究述评

贾艳敏, 朱 进

(安徽大学 历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至今,“大饥荒”问题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热点,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如对大饥荒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大饥荒的表现及暴露过程、大饥荒的应对措施以及大饥荒发生的原因等问题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纠正了一些流行了几十年的错误说法,理清了史实,匡正了历史观念。档案资料、新修地方志及口述资料等材料以及统计学、数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是这些问题的研究得以深入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大饥荒; 非正常死亡; 大跃进; 中国当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5)02-0014-11

国内学术界对“大饥荒”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30多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1—2000年为起步阶段;2001—2011年为取得重要成果阶段;2012—2014年是由于争论而推动学术研究继续深化的阶段。回顾学术史,检讨有关论点和方法,对于弄清事实,匡正历史观念,应该是十分有益的。

—

“大跃进”运动导致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这场饥荒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严重的饥荒。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严厉批评了“黑暗风”之后,它就被统一称为“三年自然灾害”。随着政治形势的急速“左”转,这个问题上的学术研究成为禁区。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承认“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并且指出其原因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sup>[1]24</sup>。从此,以“三年国民经

济严重困难时期(简称‘三年困难时期’),代替了过去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提法。尽管这个结论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但是,它起到了打破坚冰的作用,解放了思想,促进了学术界的研究。

大饥荒问题的研究是从资料的整理、出版开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辑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于1981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分上下两册,时间跨度为1949—1981年。其中下册所收录的《中共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两个材料,首次披露了大饥荒严重地区灾情上报以及中央的批示。《中共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中说,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情况很严重,但并没有公布三省向中央的报告的具体情况;《中共中央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全文公布了信阳地委写给河南省委、中南局、中央的长达1万多字的《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虽然《报告》多处掩盖、歪曲历史事实,但还是披露了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的基本情况。这是官方首次

收稿日期: 2014-1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DJ019)

作者简介: 贾艳敏,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当代史研究;朱 进,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当代史研究。

公布大饥荒中最有代表性的、最严重的事件——“信阳事件”的有关数据。

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首次披露了1959到1961年的人口数据。这是研究大饥荒时期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非正常死亡数目至关重要的资料,成为后来研究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口的重要依据。

1987年蒋正华发表于《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杂志上的《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识别》一文是其主持的由国家统计局牵头的人口研究课题成果的一部分。作者利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出生率、死亡率、重报率、漏报率等,通过建立参数估计模型及其求解,得出“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1700万人”的结论。这是国内最早对大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的研究成果。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人口学会和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联合召开专家会议对这一研究成果进行了评审,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参加评审的专家学者对这一结论给予了充分肯定<sup>[2]</sup>。

李锐作为“大跃进”和大饥荒的见证人,根据自己当年的工作笔记撰写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于1989年由北京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内部控制发行,印数不多。1994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增订本。本书在关于会议小组发言的内容中,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分别谈到了河南、湖北的饥荒情况。1959年7月4日,吴芝圃在中南组发言中说:“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虚报浮夸也最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基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者3600人,坚决清洗。农民的工具、树木、房子等,都算了细账,退赔了……春节时有几万人浮肿”<sup>[3]28</sup>。实际上在1958年12月河南省委召开的会议上,粮食产量虚报、干部违法乱纪严重等问题,即已发现,尤其密县已经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件<sup>[3]29</sup>。王任重说湖北的灾情“比1954年大水灾情更困难。今春500万人几两粮,吃稀饭,教训才深刻。1954年没吃过12两以下。已死了1500人,15万人患浮肿病”<sup>[3]29</sup>。这是在私人著

作中首次涉及饥荒、浮肿病和饿死人的情况。由于李锐是庐山会议的亲历者和毛泽东的通讯秘书,该书的资料来源于作者的庐山会议记录,真实性很高,加之20世纪80年代以后,李锐不断对当代史进行反思,所以该书出版后,迅速受到广泛关注。这也可以看作是“大跃进”大饥荒研究的开山之作。

1989年,共和国走过了40年的历程。逢五逢十纪念是中国人的习惯。学术界对共和国40周年最好的纪念应该是重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1949—1989年的中国》丛书。其中第二本为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研究的是1956至1966年的中国。该书涉及“大跃进”时期大饥荒的具体状况、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数。这是在私人著作中较早对这个问题的论述。

199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40年国是反思丛书”,中国人民大学谢春涛的博士论文《大跃进狂澜》是丛书之一种。谢春涛在书中披露了部分城市的大饥荒和农村饿死人严重地区的情况以及全国1960年净减人口1000万。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书中关于大饥荒灾情的内容较少,资料有限。

20世纪90年代初,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sup>①</sup>。这是中央高层领导首次公开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的回顾与反思。该书的出版在党史和国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其中下卷的相关内容中仍然用了“三年困难时期”的概念,但对造成困难的原因、困难时期的饥荒状况以及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万等情况有所披露和反思<sup>[4]873</sup>。

1993年金辉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根据1957—1965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得出“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的结论<sup>[5]</sup>。这和蒋正华在1987年的研究结论有较大出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8年金辉又发表了《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一文对“三年

<sup>①</sup>该书于199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2008年中共党史出版社据1997年的修订本重印。

自然灾害”的说法持否定的态度<sup>[6]</sup>。金辉的这两篇文章在以后的大饥荒问题的研究中多次被引用。

李若建对大饥荒的研究卓有成效,他认为饥荒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祸、天灾、自然条件等都是饥荒发生的因素<sup>①</sup>。

2001年至2012年,是大饥荒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时期。

2002年高华的《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一文研究了大饥荒时期的各种粮食食用增量法及其效果、代食品运动决策的出台、代食品名录及其营养成分的宣传等<sup>[7]</sup>。

2005年,曹树基的《大饥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人口》一书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这是第一部专门研究大饥荒时期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该书“采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历年人口数,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的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sup>[8]14-28</sup>。由于该书在香港出版,大陆不容易看到,但基本思路方法和结论以论文的形式曾在2005年《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上发表<sup>[9]</sup>。

2006年,贾艳敏的《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以下简称《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一书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运用个案解剖的方法,分析了这个“大跃进”时期的全国典型,同时也是“信阳事件”的重灾典型。其中对这个公社的饥荒状况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有详细披露。

2008年是“大跃进”发动50周年,这一年内地鲜有论著问世,而香港地区则出版了三部专著,即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以下简称《墓碑》)、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

纪事》(香港田园书屋2008年版,以下简称《麦苗青菜花黄》)和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sup>②</sup>。其中,《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曾任新华社记者,在长达十几年时间里关注大饥荒问题,在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区搜集了大量档案资料,采访了100多名当事人。作者在“代前言”中解释说,书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了纪念1959年饿死的父亲;二是为了纪念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三是为了批判造成大饥荒的制度;四是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曾查出疑似肝癌,后来复查排除了,但加上自我感觉本书的写作似乎存在风险,也许本书就是自己的一块墓碑<sup>[10]7</sup>。该书是第一本专门研究全国大饥荒的专著,出版后影响很大,已经多次再版,同时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在海外出版。虽然没有中国内地的版本,但网上的电子版广泛流传,很受学术界重视,也引发过不同观点的争论。

2009年林蕴晖的《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一文,对大饥荒时期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目的研究,得出了和曹树基一致的结果。

2010年北京出版的大型经济学学术期刊《经济学》(季刊)第3期刊发了“大饥荒研究”专栏,共有4篇文章。其中杨涛强调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失误是导致“大跃进”灾难的核心成因<sup>[11]</sup>;刘愿则从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关系方面入手分析,认为从经济体制角度看,农民受国家和集体的双重侵害,所以导致大饥荒<sup>[12]</sup>。

“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化和大炼钢铁运动与大饥荒有密切的关系。赵筱侠通过研究“大跃进”时期江苏省水利化运动——“梯级河网化运动”,指出该运动“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占用了大量的耕地,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损失,使江苏全省农民付出了巨大代价,成为引发后来经济困难和大饥荒的原因之一”<sup>[13]</sup>。张桂远通过研究1958年河南商城县大炼钢铁运动,认为大炼钢铁占用了农业劳动力,导致粮食用量剧增;此外大炼钢铁运动还将农民的铁锅收去,造成有米无锅的现象。这些都是造成饥荒加重的重要因素<sup>[14]</sup>。

①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载于《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第40—44页;李若建:《自然灾害与自然条件对困难时期饥荒形成的影响》,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9期,第17—23页;李若建:《经济体制因素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影响》,载于《开放时代》2001年第8期,第86—90页。

②该书是香港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一,2008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至此,大饥荒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饥荒和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已成学界共识。然而2012年之后,却出现了一些否认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甚至否认大饥荒的说法。

2012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在其新浪微博上说:“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安徽很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污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见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sup>①</sup>。这条微博迅速成为网络舆论的焦点,引起众多网友的批评,更有网友贴出反驳的证据,来证明饥荒和饿死人情况的存在。资深新闻评论人李学鹏在微博上说:“身为媒体同道中人,说话要以事实为依据,要能正视一个民族苦难的历史。为此,我约你一起去调查采访,采访费用我承担,采访报告你在人民日报刊发。特此约战,望应战。”<sup>②</sup>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林治波第二天即在其微博上道歉:“‘由于出生率大幅度下降,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一千万……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年版第329页)我认可这个说法,昨天的微博不准确,特此更正,并对当年死于饥荒的父老乡亲致以深切的悼念和缅怀”<sup>③</sup>。

这次“微博事件”之后,仍然有人以学术研究的面貌发表文章,否认大饥荒及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2013年5月10日李慎明提出了否定“饿死三千万”的观点。他说:“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sup>[15]</sup>

8月23日,孙经先发表了题为《“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的文章,断言关于“大饥荒非正常死

亡人数三千万”为重大谣言,认为有关统计人口的减少是由于当时人口迁移过程中户口的漏报重报所致,他还自造了“营养性死亡”的概念<sup>[16]</sup>。

9月9日,孙经先发表《“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一文,指名批判杨继绳《墓碑》中关于饿死人口总数的结论,批评杨书中的绝大多数关键性“饿死人数”都是虚假的;“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之所以广泛传播,杨书起了重大作用<sup>[17]</sup>。

其实,孙经先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的《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一文中就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只是当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应。而这次受到了学界的广泛批评。

2013年12月杨继绳发表了题为《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的文章回应孙经先<sup>④</sup>。对于孙经先指责的所谓“十条虚假数据”,杨继绳逐条进行了证实。对于孙经先提出的所谓人口迁移过程中户口的重报漏报导致人口减少的观点,杨继绳说,历史事实是“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人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的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孙先生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这些人吃什么”<sup>[18]</sup>?即使存在户口的重报、漏报,历史研究也要拿出有依据的事实来,但“孙经先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依据,没有举出哪些地区的人口迁移中不带户口的事例,没有举出其中哪些人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只是他自设了一些脱离实际的人口概念(‘实际人口’‘户籍人口’‘虚拟人口’)以后,用貌似科学的数学计算,绕来绕去绕出来的结论”<sup>[18]</sup>。对于“营养性死亡”的概念,杨继绳利用医学知识证明此概念牵强生硬,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学术态度的

<sup>①</sup> 详见 [http://www.weibo.com/linzhibo#!linzhibo?is\\_search=0&visible=0&is\\_tag=0&profile\\_ftype=1&page=146#feed-top](http://www.weibo.com/linzhibo#!linzhibo?is_search=0&visible=0&is_tag=0&profile_ftype=1&page=146#feed-top)。

<sup>②</sup> 详见 <http://t.qq.com/lixuepeng73/?mode=0&id=86267101904504&pi=56&time=1335777431>。

<sup>③</sup> 详见 [http://www.weibo.com/linzhibo#!linzhibo?is\\_search=0&visible=0&is\\_tag=0&profile\\_ftype=1&page=146#feed-top](http://www.weibo.com/linzhibo#!linzhibo?is_search=0&visible=0&is_tag=0&profile_ftype=1&page=146#feed-top)。

<sup>④</sup> 杨继绳:《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载于《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第75—81页。2011年孙经先发表否认大饥荒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文章,2012年,杨继绳曾在纽约时报上撰写《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一文批评孙经先。2013年,孙经先继续自己的观点,并点名批评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杨继绳再次撰文予以回应。

不严谨<sup>[18]</sup>。

李若建既不同意孙经先提出的“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 250 万人以下”的观点,也不同意“营养性死亡”的概念。他认为孙经先的这种研究既没有掌握多少人口统计数据,更加谈不上对数据作认真的评估<sup>[19]</sup>。

汕头大学医学院教授李澈的《大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的另一种计算》一文表明,1959—1961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481.9+1 700.2+847.6=3 029.7 万人<sup>[20]</sup>。并以此证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金辉、曹树基、林蕴晖、杨继绳等人的研究结论是正确的。

2013 年 11 月 2—3 日,在开放论坛举行的主题为“统计与政治”的讨论会上,曹树基对孙经先“因户籍重报漏报导致人口统计数字减少而不是实际的死亡人数”的说法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曹树基说“户籍漏报重报”是孙经先自己的想象,因为孙经先引用的山东省的数据没有出处。户籍迁移导致的漏报重报只是孙经先的一个假定,这个假定是不存在的。“你把公安局那批搞户籍统计的人当做傻瓜在对待啊。我们知道,公安局年底的户口会有一个冻结的制度,是不会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的。即便真的出现户口迁入,那还有一个户口迁出做平衡。这个问题涉及方法论的问题,孙老师你真的不是在做历史学,而是在做数学的假定和推导,你这样的推导没有任何意义。”“你认为你在今天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但历史的事实真的不是你讲的那种情况。你不去查证基本事实……一点也不引用他人的研究……搞出一大堆神话给我们听。我很无语,你真的不可以这样做。你罔顾历史事实,却先设定、假定了很多事实,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呢?”<sup>[21]</sup>

洪振快利用大量的官修地方志中的材料,证明全国各地存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依据官方公开的材料估计,四川、安徽、河南三省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已不下 1 300 万人。”“大饥荒期间全国到底死了多少人,迄今为止官方没有公布数字。但从地方志提供的经官方认可的数字来看,‘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非正常死亡极其严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大饥荒’的存在无法否认掉,人命关天,生命的价值至高无上!但是直到今天,还有人试图否定发生过大饥荒的事

实,认为那是‘重大谣言’。其实,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死亡率正常、‘营养性死亡’人数在 250 万以下等等说法,都是完全缺乏官方材料支持的臆说,严重脱离事实。任何‘研究’,都必须尊重事实。孙经先声称自己研究过程中‘专门查证了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 600 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查证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这一估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根据笔者从地方志查证的情况来看,这是公然撒谎。”<sup>[22]</sup>

## 二

30 多年的大饥荒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大饥荒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二是大饥荒的表现及暴露过程;三是大饥荒的应对措施;四是大饥荒发生的原因。

### (一) 大饥荒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是大饥荒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同时也是研究的难点。由于当时权威统计资料的缺失,造成这一问题研究的困难。

丛进在《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中写到三年“大跃进”的代价时说,“人民生活——商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奇缺,人民生活陷入连续 3 年(1959 至 1961 年)的严重困难之中”<sup>[23]272</sup>。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粮、油、肉消费大幅度减少。人民身体素质下降,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 1959 年是 6.72 亿人,1960 年为 6.62 亿人,即减少了 1 000 万人,1961 年比 1959 年减少了 1 300 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 20‰ 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 1961 年总人口应比 1959 年增加 2 700 万,两者相加,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 4 000 万左右。”<sup>[23]272-273</sup> 谢春涛在《大跃进狂澜》一书中披露了部分城市的大饥荒和农村饿死人严重地区的状况以及全国 1960 年净减人口 1 000 万<sup>[24]203</sup>。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讲到“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时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谨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 年全国总人口减少 1 000 多万。”<sup>[25]613</sup>

蒋正华认为“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 1 700 万人”<sup>[26]</sup>。金辉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

发布的数据计算分析,认为:“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sup>[5]</sup>。1998年李若建撰文称1958—1961年“因饥荒而死亡的人口在1530万~2470万人之间”<sup>[27]</sup>。

根据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1960年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但整个大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还没有确定的数字,因而也成了研究和争论的焦点。曹树基以1953年、1964年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了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sup>[9]</sup>。林蕴晖用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计算,认为1958—1962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sup>[28]</sup>。杨继绳认为1958—1962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600万<sup>[10]463</sup>。李激的研究结果为大饥荒非正常死亡3029.7万人<sup>[20]</sup>,这和金辉、曹树基、林蕴晖、杨继绳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

## (二) 大饥荒的表现及暴露过程

学界对“大跃进”时期大饥荒的表现及暴露过程的研究开始较晚,成果不多。

贾艳敏对河南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的研究,再现了当地在大饥荒中的种种惨状,以及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而对农民进行捆、绑、吊、打等恶劣作风<sup>[29]221-231</sup>。

《墓碑》记述了全国饥荒最严重的11个省的情况<sup>[10]</sup>。东夫对川西坝子农民的大量逃荒、缺粮、浮肿病、经期妇女停经、子宫下垂、干瘦病、饿死人、人食人事件的详细描述,反映了大饥荒时期农村普遍存在的状况<sup>[30]11</sup>。

林蕴晖在《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一书中介绍了1959至1961年的饥荒表现,其中重点讲述了饥荒中的典型事件——河南“信阳事件”和甘肃“夹边沟事件”<sup>[31]598-615</sup>。

各地大饥荒的暴露均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贾艳敏、许涛通过研究“大跃进”时期河南的“豫东事件”和“信阳事件”逐步暴露的过程和中央采取的救济措施,指出地方各级政府存在掩盖真

相,压制打击反映灾情的干部群众,阻挠中央调查组的调查等行为,从而使饥荒加剧,详细说明了河南省饥荒和饿死人事件的彻底暴露及采取有力的救灾措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sup>[32]</sup>。姚宏志从饥荒史角度,选择从省级行政单位——安徽省政府——地方史路径,全面考察和梳理了1959—1961年安徽饥荒的发生发展过程和安徽省政府面对饥荒的反应过程,深入揭示“两个过程”间的内在关联<sup>[33]</sup>。

## (三) 大饥荒的应对措施

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严密的组织,尤其是公共食堂制,致使饥荒发生时农民能够自救的余地极其小。更由于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的瞒报,饥荒无法暴露。在大规模的饥荒、严重饿死人的情况普遍发生时,各地的灾荒到了无法掩盖的程度,实情才得以上传到中央,中央出台各项措施,灾情得到缓解。

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救灾措施包括应急措施和体制性管理措施。尚长风总结了中央政府应对饥荒的紧急措施,如降低粮食征购价、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节衣缩食、“瓜菜代”、提高粮食收购价等<sup>[34]</sup>。罗平汉考察了代食品运动的起因、发动过程和代食品的种类以及代食品在应对大饥荒中的微小作用<sup>[35]</sup>。湘潭大学李应斌的硕士毕业论文《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运动探析》(2010年)对代食品运动做了相对完整的考察与分析。

除了应急措施之外,经济管理体制的改变是解决饥荒的长远措施,其中包括解散公共食堂、精简城镇人口、允许部分地区实行责任田等等。李若建<sup>[36]</sup>、罗平汉<sup>[37]</sup>、贺永泰<sup>[38]</sup>、陈建兰<sup>[39]</sup>、陈理<sup>[40]</sup>等人对城市精减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而采取的种种措施和效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安徽率先实行的责任田效果显著,但这方面研究性文章不多,多数是亲历者的回忆。当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秘书和省委调研室理论组组长的陆德生,参与了安徽推行责任田的全过程。陆德生于2006年发表《六十年代初安徽责任田问题风波》一文,回顾了安徽责任田实施的过程。长期从事农村问题报道的新华社高级记者陈大斌的《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次预演——安徽“责任田”兴

起始末》的文章<sup>①</sup>及戴兴华、北辰编著的《春雨秋风责任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对安徽实行责任田的来龙去脉作了翔实的论述。季节利用定远县档案馆馆藏档案,从定远县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视角,对责任田在定远县的实施步骤、具体方法、绩效评估、制度缺陷等进行了探究<sup>[41]</sup>。这是近年来利用县级档案资料对安徽责任田深入研究的重要成果。

#### (四) 大饥荒发生的原因

关于大饥荒发生原因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天灾和人祸,二是苏联逼债,三是人祸。

20世纪80年代之前,官方对“大跃进”时期大饥荒发生原因的唯一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1981年的历史决议虽然把大饥荒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政策失误,但“自然灾害”仍然被认为是原因之一。对此说法,金辉通过研究《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的数据,认为“1959—1961年,中国并没有发生什么‘严重自然灾害’,而‘基本上风调雨顺’”<sup>[5]</sup>。金辉在《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一文中,再次驳斥“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通过分析1959—1961年的气象水文资料,认为“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sup>[6]</sup>。

对于金辉的观点,李若建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大跃进的破坏、自然条件和灾害几个因素都有比较大的影响,或许用刘少奇同志当年的一句话概括比较准确,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客观地评价当时的灾害,不否认也不夸大自然条件与自然灾害因素,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助于让后人了解历史”<sup>[42]</sup>;“困难时期的大饥荒,主要是人为错误带来的恶果,但是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出发,不应该否定自然灾害有一些影响。更为正确的说法是,如果没有反右倾运动和大跃进带来的破坏,自然灾害带来的大部分破坏本来是可以克服的。认为‘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是一种‘神话’,这种看法并没有多少科学依据”<sup>[43]</sup>。同时,李若建认为,“大跃进”和大饥荒发生的人为因素中统购统销政策、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经济体制因

素也占重要方面<sup>[44]</sup>。

陈东林通过对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的分析,认为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同时也分析了各种决策错误带来的不同影响,重点把粮食作为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的比较指数,运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比例状况。由此他认为:“从农业粮食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因素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决策,农村因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增加了一倍。这与刘少奇在报告中引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基本一致的。”<sup>[45]</sup>气象学工作者张海东、张尚印、李庆祥通过研究1959—1961年期间中国气候的特点,认为“这三年期间的天气气候条件对全国的农业生产十分不利。从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来看,1959年和1961年为损失偏重年份,1960年为严重年份”<sup>[46]</sup>。

“苏联逼债”曾经是多个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科书的说法,但学术界对苏联是否逼债,以及逼债对大饥荒的影响持不同的观点。沈志华通过详细考察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及中国方面到1965年10月全部还清苏联贷款的史实,认为“苏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sup>[47]</sup>。至于苏联在1960年7月决定撤走专家,停建项目一事,沈志华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来说,苏联专家的撤离是有一定影响,但造成1960年初经济滑坡和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己的政策失误,而与苏联撤退专家没有直接关系”<sup>[48]</sup><sup>398</sup>。王玉贵赞同沈志华的观点,“在探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出现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加紧逼债,加重了困难的严重程度。现有资料证明,上述说法并无根据”<sup>[49]</sup>。郭德宏在谈到发生大饥荒的原因时说“至于说苏联撕毁合同和逼债,那更是牵强,不可能造成那么严重困难的局面”<sup>[50]</sup>。高华认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主动提出以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

<sup>①</sup>陈大斌分别以该题目连载之一、连载之二、连载之三、连载之四、连载之五、连载之六、结束篇发表于《党史纵览》2004年第6期、第7期、第8期、第9期、第10期、第11期、第12期。

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的古巴糖<sup>[51]</sup>。郑建明以翔实的资料撰写近万字的长文论述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还主动援助中国小麦和古巴糖以及推迟还债和减免部分利息<sup>[52]</sup>。徐焰认为苏联人从未在三年困难时期“逼债”,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sup>[53]</sup>。但仍然有人坚持“苏联逼债了”<sup>[54]</sup>。

人祸主要是指“大跃进”时期中央政府的各项极“左”政策。人祸因素是关于大饥荒原因研究的重点内容。

金辉认为,发生大饥荒的原因完全是人祸。首先是1949年至“大跃进”前夕错误的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导致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其次是政策失误<sup>[5]</sup>。

极“左”的政策是饥荒发生的根源。在一系列的错误政策中,大办限制农民吃饭权的公共食堂是其中影响最大的。罗平汉在《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一书中对公共食堂的兴起、推广、管理、宣传以及出现的严重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以专章内容论述公共食堂与大饥荒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密切关系<sup>[55]191-207</sup>。贾艳敏以大饥荒严重的河南省为个案,考察了“大跃进”时期的河南农村公共食堂,认为河南省之所以成为大饥荒的重灾区,以至于出现大量饿死人的“信阳事件”,“被称为‘共产主义’萌芽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使河南人民遭受严重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sup>[56]</sup>。文贯中和刘愿认为“以剥夺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对农民的全部口粮实行强制性集体化为标志的公共食堂制度是‘大跃进’饥荒最主要的成因”,并进一步指出“公共食堂的兴起、散伙、重新加强和最后迅速解散,与‘大跃进’饥荒的爆发、加剧及突然终结在时间上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与这一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有着深刻的内在因果关系”<sup>[57]</sup>。

水利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也是造成大饥荒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人为因素。赵筱侠以“大跃进”时期江苏省水利化运动为个案,揭示水利化运动是引发大饥荒的原因之一<sup>[13]</sup>。张桂远以大炼钢铁的全国典型——河南商城县的大炼钢铁运动为例,论述了大炼钢铁运动是饥荒加剧的重要因素<sup>[14]</sup>。

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饥荒发生的体制因素。杨涛强调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失误是导致“大跃进”灾难的核心成因。高度集

权、政治挂帅状态下的一大弊端是地方政府即使明知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他们仍有政治动机来拥护、执行这些政策,并且极力隐藏自己职权范围内犯有严重失误的信息<sup>[11]</sup>。刘愿认为“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从农村征购超额粮食以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民公社又通过提高集体提留比例以推动农村地区‘大跃进’,在粮食供给冲击下农民个体粮食获取权遭受国家和集体两个层面的强制性侵害,导致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sup>[12]</sup>。

为什么明显违背经济规律,甚至违背常识的错误政策能够顺利出台,并在全国雷厉风行且持续三年之久?为什么这样僵化的、弊端丛生的经济体制能够维持?杨继绳从极权制度的视角作了深层次的探讨。杨继绳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造成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盛行加剧了大饥荒,统购统销政策和公共食堂也是造成大饥荒的重要原因。这一系列错误政策的背后,总的根源是制度。这种制度表现为:“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超稳定性”,“缺乏纠错机制”等<sup>[10]492-501</sup>,简单地说就是以“中国传统的王权主义加上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为特征的极权制度”<sup>[10]490</sup>。

### 三

新材料和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是30多年大饥荒问题研究的突出特点。

第一,档案资料的利用。“大跃进”时期大饥荒的档案资料,官方公布的极少,绝大部分没有被整理、出版,散见于各地档案馆。查阅1949年以后的档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这些档案资料对于大饥荒的研究又极其重要。学者们不辞辛苦,到各地档案馆查找相关资料,撰写论文论著。在档案资料的应用方面,主要有4部论著(论文):杨继绳《墓碑》、东夫《麦苗青菜花黄》、马龙虎《寿张大跃进运动研究》和贾艳敏《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杨继绳跑遍十几个省、市查找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成为《墓碑》的资料基础。东夫历时十余年,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



这些档案资料成为其著作的主要资料来源。马龙虎、贾艳敏在他们的论著中也都应用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

第二,新修地方志的广泛应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县,甚至一些乡镇都陆续编修了地方志。这些地方志中关于大饥荒的内容,虽然有局限,但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正如一位作者说:“从地方志了解大饥荒有很大的局限性。地方志提供的死亡数字与实际情况相比,有可能是缩小的,但绝不可能夸大。尽管有许多缺陷,但地方志是官方主持纂修的,它毕竟提供了经官方认可的大饥荒死亡情况,对了解全国大饥荒的基本情况仍有很大价值。”<sup>[22]</sup>所以,这些新修的地方志资料被学者应用到大饥荒的研究之中。杨继绳的《墓碑》在书后参考文献中列举出的地方志就有62种之多。曹树基的《大饥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人口》一书使用了1058种地方志资料<sup>[8]10</sup>。洪振快的《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一文,从题目即可知,文章完全利用地方志的材料来研究大饥荒的死亡人口数字问题。虽然全国的死亡人数无法确定,但从地方志这种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足以证明“大跃进”时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和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事实。

第三,统计学、数学方法的应用。以人口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数据分析,建立参数估计模型的统计学、数学方法被应用到大饥荒的研究之中。在关于大饥荒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中,蒋正华是最早使用这种方法的。蒋正华在《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识别》一文中,利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三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通过数据分析,认为“这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质量是高的,特别是人口年龄、性别的报告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从全国范围来说,三次普查的完全性也十分接近”<sup>[26]</sup>。通过“建立参数估计模型”和“对参数估计模型的求解”,得出“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1700万人”的结论<sup>[26]</sup>。金辉根据统计局发布的1957—1965年的总人口数、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数据计算来研究大饥荒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李若建以1957年的人口

死亡率为标准,凡高于此标准的死亡率均归为饥荒的作用,根据大饥荒时期的死亡率与1957年的死亡率的比较计算得出,因饥荒而死亡的人口在1530万~2470万人之间<sup>[27]</sup>。李激对“通常年份的死亡人数、统计局的1958—1961年出生人数和出生率、自然增长数与总人口增长数之间的差数、逐年修正死亡人数和死亡率”的分析修正计算出了大饥荒时期的非正常死亡总数<sup>[20]</sup>。

第四,口述访谈资料的搜集。亲历者的口述访谈资料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与文字资料互证,弥补文字资料的不足。杨继绳访谈了在大饥荒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比如“几个‘信阳事件’当事人(健在的当年地委和县委干部)”<sup>[10]18</sup>,有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的记者鲁保国<sup>[10]26</sup>、大饥荒年代任信阳地委秘书长的王秉林<sup>[10]21</sup>、1959—1960年任信阳地区专员的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等<sup>[10]26</sup>,得到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东夫书中的资料大量来源于对亲历者的采访,他们有:明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宋文彬(温江地委第一书记)、曾茄(温江地委副书记)、申培林(温江地委农工部副部长)、杨玉成(温江地委秘书长)等等<sup>①</sup>。另外,马龙虎、贾艳敏也都访谈了当地若干大饥荒的亲历者。

第五,典型区域的个案研究。典型化、样本化是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这个个案,可以是一个比较能够集中概括起来的问题,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可以是一个历史人物,可以是一种什么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特别意义的社会现象,等等。东夫以川西地区为个案,马龙虎以寿阳县为个案,贾艳敏以峭岬山公社为个案,分别研究了一个地区、一个县和一个公社的大饥荒。这些个案,都具有典型性、样本性,是所在省份大饥荒的一个代表,同时也是全国大饥荒的重灾区。对这些重灾区的研究,在大饥荒问题的研究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学者们经过30多年的努力,对大饥荒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些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对有些流行了几十年而事实上是不科学甚至不正确的说法给予了纠正;有些问题的研究已经

<sup>①</sup>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香港田园书屋2008年版,第372页,括号内的职务是他们在“大跃进”期间的身份。

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或者说已经触及了最根本之处;一批新材料被搜集整理和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被应用;等等,都是值得肯定的。随着中国法治化、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重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贯彻执行,必将推动大饥荒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 参考文献:

- [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2] 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J].中共党史研究,1997(2):1-14.
- [3]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 [5] 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J].社会,1993(增刊2):13-22.
- [6] 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J].方法,1998(3):12-14.
- [7] 高华.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J].二十一世纪,2002(8):71-82.
- [8] 曹树基.大饥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人口[M].香港:香港时代国际有限公司,2005.
- [9]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J].中国人口科学,2005(1):14-28.
- [10]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M].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
- [11] 杨涛.探讨大饥荒的成因:集权、计划失误与政治行为的影响[J].经济学,2010(3):1143-1150.
- [12] 刘愿.“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J].经济学,2010(3):1119-1142.
- [13] 赵筱侠.“大跃进”时期江苏省的梯级河网化运动[J].江苏社会科学,2011(6):209-216.
- [14] 张桂远.1958年商城县大炼钢铁运动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历史系,2011.
- [15] 李慎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J].红旗文稿,2013(9):18-21.
- [16] 孙经先.“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8-23(A07).
- [17] 孙经先.“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9-09(A05).
- [18] 杨继绳.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J].炎黄春秋,2013(12):75-81.
- [19] 李若建.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人口统计数据考略[J].南方人口,2014(1):21-27.
- [20] 李激.大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的另一种计算[J].炎黄春秋,2012(7):46-52.
- [21] 左凤荣,冯筱才,等.统计与政治:上[J].开放时代,2014(1):11-77.
- [22] 洪振快.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J].炎黄春秋,2014(5):12-22.
- [23]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 [24] 谢春涛.大跃进狂澜[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 [2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 [26] 蒋正华.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识别[J].中国人口科学,1987(1):56-63.
- [27] 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J].中国人口科学,1998(4):40-44.
- [28] 林蕴晖.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J].炎黄春秋,2009(5):32-38.
- [29] 贾艳敏.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嵛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 [30] 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M].香港:香港田园书屋出版社,2008.
- [31] 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 [32] 贾艳敏,许涛.“大跃进”时期河南大饥荒的暴露过程[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61-67.
- [33] 姚宏志.1959—1961年安徽饥荒与省政府反应过程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2009.
- [34] 尚长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紧急救灾措施[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4):50-57.
- [35] 罗平汉.共和国历史上一场特殊的代食品运动[J].炎黄春秋,2006(6):30-34.
- [36] 李若建.困难时期的精简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J].社会学研究,2001(6):31-42.
- [37] 罗平汉.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精减[J].文史精华,2003(4):22-27.
- [38] 贺永泰.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市精简职工论析[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69-174.
- [39] 陈建兰.1961—1963年中国城镇人口精简浅析[J].兰州学刊,2006(6):189-192.
- [40] 陈理.60年代初精减职工、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决

- 策的研究[J].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6(6): 20—27.
- [41] 季 节. 20世纪60年代初安徽“责任田”研究——以定远县为例[D]. 合肥: 安徽大学历史系, 2013.
- [42] 李若建. 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J]. 中国人口科学, 1998(4): 40—44.
- [43] 李若建. 自然灾害与自然条件对困难时期饥荒形成的影响[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0(9): 17—23.
- [44] 李若建. 经济体制因素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影响[J]. 开放时代, 2001(8): 86—90.
- [45] 陈东林. 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4(1): 83—93.
- [46] 张海东, 张尚印, 李庆祥. 对我国1959—1961年气候条件的分析与评估[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4(1): 83—93.
- [47] 沈志华. 关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2(3): 83—93.
- [48] 沈志华.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3.
- [49] 王玉贵. 试析造成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困难的苏联因素——评苏联政府的“逼债”说[J].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10(5): 48—51.
- [50] 郭德宏. 对国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几个问题的思考[J]. 史学月刊, 2002(2): 72—78.
- [51] 高 华. 初读《杨尚昆日记》[J]. 领导文萃, 2002(7): 115—121.
- [52] 郑建明. “苏联逼债”是怎么回事?[J]. 文史精华, 2012(12): 20—27.
- [53] 徐 焰. 苏联人从未在三年困难时期“逼债”[J]. 国家人文地理, 2013(12): 100.
- [54] 史 云. 那些年, 苏联确实“逼了债”[J]. 红旗文稿, 2013(12): 31—34.
- [55] 罗平汉. “大锅饭”: 公共食堂始末[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 [56] 贾艳敏. “大跃进”时期的河南农村公共食堂[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3(6): 60—67.
- [57] 文贯中, 刘 愿. 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J]. 经济学, 2010(3): 1163—1176.

(责任编辑 潘亚莉)

## A Review of the Great Famine Studies by Domestic Scholars

Jia Yanmin, Zhu J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Great Famin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modern China studies and yielded ample results. Breakthrough has been achieved regarding some important problems such as the population of abnormal deaths during the Great Famine, the manifestation and process of its being brought to light, the actions taken to deal with the Famine, and its causes. Some decades-long wrong sayings have been put right, with facts clarified and ideas rectified. The use of new historic sources including archival sources, newly-compiled local chronicles and oral data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 of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s are behind these deepened researches.

**Key words:** the Great Famine; abnormal death; the Great Leap Forward;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